

现代著名御用诗人和剧作家的典型代表人物



诗人贺敬之

贾漫◎著

下

贺敬之，1924年生。山东枣庄人。1942年毕业于延安鲁艺文学系。历任华北联大文学院教师，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主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等。4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放歌集》、《贺敬之诗选》，评论集《贺敬之文艺论集》，长诗《回延安》、《放声歌唱》、《雷锋之歌》、《中国的十月》，歌剧剧本《白毛女》（参加执笔）等。

读新报法信
百折再道之明来
贺敬之

大众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钟 艺

汇智泉 

13397801809 54661809

读新报法信
百折再定之明来
贺敬之

贺敬之，1924年生。山东枣庄人。1942年毕业于延安鲁艺文学系。历任华北联大文学院教师，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主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等。4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放歌集》、《贺敬之诗选》，评论集《贺敬之文艺论集》，长诗《回延安》、《放声歌唱》、《雷锋之歌》、《中国的十月》，歌剧剧本《白毛女》(参加执笔)等。

ISBN 978-7-80094-842-8



03 >

9 787800 948428

定价：63.00元（上下册）

现代著名御用诗人和剧作家的典型代表人物



诗人贺敬之

贾漫◎著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



26 工农兵学干大字报研讨会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人们最初并不理解，是在现实中逐渐理解、逐渐觉悟的。

不论有多么复杂，极左路线是贯穿运动全过程的主旋律。全国剧协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有些影响的人物无一幸免。贺敬之是作为“周扬黑线人物”被揪出来的，或曰周扬包庇的“漏网右派”，因为贺敬之是被当作“一贯右倾”而不断受到批判，并且受到处分的。

既然贺敬之的王牌作品《白毛女》都被极左路线批判、篡改，他在“广州黑会”上的发言与活动，周扬、何其芳、胡风对他的赞扬，对他的《乡村的夜》的高度评价，不会不成为把他打成“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干将、漏网右派、胡风分子”的罪证。可是从他少年参加革命的清白历史和他全部作品内容来看，特别是《南泥湾》、《白毛女》、《回延安》、《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三门峡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精品，在亿万工农兵群众中，在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来看，把他划成“三反分子”，不仅是不公正的，也是使广大读者愕然的。

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应回顾一下，运动开始，首先就是要解决广大群众的“很不理解”，广大干部的“很不得力”，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做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即首先把文

教界中一切稍有名气或稍有关连的人都当做被扫的“牛鬼蛇神”，或者是“走资派”，或者是“右派”、“反动权威”等等予以横扫之。几乎是顷刻之间大批大批的人就被揪了出来。从北京到各地都是如此，内蒙的作家们，基本上都被揪了出来。在全国文联和剧协机关中，知道贺敬之文艺思想的人，过去就批判过贺敬之的人，此时绝不会“让贤”，而是“举贤”，于是，先把这位“老批判对象”抛了出去，这就不奇怪了。

可是社会上最广大的工农兵学干，对待作家和诗人，只看作品的社会效果，他们头脑中都有“自己的”是非标准。

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以及在北京的所有文化单位中，许多作家、艺术家和领导干部所受的折磨和迫害，是难以尽数的：老舍先生就是在这种折磨和污辱中自杀的；田汉同志也是在折磨和污辱下病死于幽禁之中的；前边提到过的海默，更是在所谓“群众专政”之下被毒打而死的……

贺敬之被揪出来以后，立即被关进“牛棚”即“黑帮队”，连续不断地在机关大会上被批斗，在供全国来访者观看的批斗会上和田汉、阳翰笙等人一起被示众。他的家被抄，爱人柯岩也被她所在单位造反派打成了“黑线人物”。

“二月逆流”之后，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柯岩在本单位贴出大字报声明：“我不是漏划右派，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不是黑帮……自即日起退出黑帮小组。”旋即不顾造反派的监视和阻挠，手提糍糊桶，领着不满九岁的女儿，到文联大楼贴出了大字报：《挺起腰杆干革命，贺敬之是个好同志！》

这真是“胆大包天”。在此时此际，光天化日之下，竟敢为贺敬之这个“要犯”翻案，这不能不在全国文联大院掀起轩然大波，不能不在北京文化界和全国的串连者中引起轰动。

性格刚毅的柯岩，此举并非一时义愤，也并非蛮勇，她与贺敬

之共同生活了十几年，贺敬之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怎么能够不知道呢？然而，站出来贴大字报，和造反派针锋相对，面对着极左狂潮肆虐和打砸抢分子的恐怖行动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这该是何等大无畏的精神！没有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坚定信念，这是绝不可能做到的。对于她自己来说，这必然是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一句话：“豁出去了！”

“文革”开始，随着多年“反修防修”的宣传，加之“两报一刊”的宣传，都说这场革命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但时间长了，随着种种不正常的、荒谬的、残酷的事实出现，人们渐渐看得清楚了，特别是“人人头上摸一把”，轮到自己头上，说你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你能不推己及人，重有所思并渐有所悟吗？

但是，“文革”中最奇特的现象之一是，“造反有理”变成了一切本来无理的东西只要以造反的名义出现就是有理的依据。这样，再清白的人，也能找到打倒他的“理由”。贺敬之出身贫农，父亲很早去世，查三代也查不出反革命，也查不出封建官僚，又没有被捕过，打不成“叛徒特务”，最后竟有人开始散布他是什么“空降特务”，这简直成了血泪闹剧。

贺敬之从1966年开始，经过一年多的思考，终于在1967年12月14日贴出自己解放自己的大字报，题目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挺起腰杆干革命》。这张大字报只承认自己是有错误的革命干部，以自己的革命经历和工作表现为据，理直气壮地否定了强加给他的各种政治帽子，明确宣布：自即日起退出“牛棚”（黑帮队）。

评价一个人的历史行为是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的。要求贺敬之在当时就认识到并从行动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不仅是极不实际的，也是唯心主义的。

贺敬之这张大字报的重要意义在于，以自己为例证，在文艺界和社会上公开指斥了“文化大革命”推行的“打倒一切、颠倒是非”

的做法是极端荒谬的，并采取了公开与之抗争的具体行动。

这张大字报的贴出，该冒多大的危险啊，该有多大的勇气啊！这种勇气的产生，除了对党、对人民、对自己的坚定信念以外，患难与共的伴侣在他政治生命乃至血肉生命危难时的坚定支持，比晴天的霹雳还要洪亮，比喊一千声“我爱你”更有力量。这是用鲜血和生命呼唤出来声音，这声音使“金声玉振”这一形容词也显得黯然失色，这声音终于使他挺起腰杆。

这张大字报贴出去以后，广大串连的工农兵和红卫兵，以及文联大院内的群众，纷纷在大字报上加注小批，或写小字报张贴，支持贺敬之自己解放自己，挺起腰杆干革命。由于支持人愈来愈多，大字报小字报一张接一张，签名者支持者一个接一个，造成一种很大的社会声势，使打砸抢分子不敢对贺敬之轻举妄动。这是诗人贺敬之一生讴歌人民换来的非常闪光的一页，也促使他更加坚定地与人民和党的事业站在一起。

除了小字报和旁批以外，还有人专门写出大字报表示支持。下面是一个小小的风波：

坚决支持贺敬之同志站出来革命！

我们是从贺敬之同志的创作知道他的，对他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去年×××在文艺界推行反动路线时，我们曾在旧剧协“示众斗争会”上见他一面。当喊到“打倒三反分子贺敬之”口号时，心里着实不安，我一连串向自己提出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建国以后，曾写过不少歌颂毛主席歌词（高楼万丈平地起、南泥湾、看，我们胜利的旗帜迎风飘扬、毛泽东领导着我们走向解放……等）的贺敬之会是三反分子吗？在《雷锋之歌》热情歌颂英雄的成长道路，热情歌颂无限忠于毛主席的

高贵品质，尖锐抨击现代修正主义，热烈歌颂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贺敬之会是三反分子吗？我们觉得贺敬之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毛主席、对党、对革命人民的热烈感情是真挚的，深厚的，感人的，这种感情，难道和“黑帮”可以调和吗？……这些一连串的问号，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不能得到解答。

可是，现在我们看了贺敬之同志的大字报以后，感到突然豁亮起来。原来贺敬之同志是一个工作中犯有错误的革命干部，而不是敌人。我非常高兴！这与我们原来从他的作品中，所得到的对他的印象，一致起来了，我一年多的问号，基本上解决了，我以兴奋的心情，连看了两天大字报，越看越觉得贺敬之同志，虽然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统治下，做过一些坏事，说过一些错话，犯有严重的错误，但是……

贺敬之同志出身贫农，16岁参加革命，到了延安，他在《回延安》诗中写道：“……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由于党和毛主席的培养和教导，26年来，不但未写过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毛泽东思想的毒草，而且还曾同文艺黑线做过一些斗争，这在文艺界，应当说是不错的干部了。

从贺敬之同志的作品看，既然他的大部分作品，是热情洋溢地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歌颂革命斗争中的英雄人物的，那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是“黑帮”，如果把这样的同志打倒，那是不堪设想的！

贺敬之同志绝不是敌人！他的错误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应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现在贺敬之同志站出来革命，是很正确的，我们表示坚决支持！我们认为贺敬之同志敢于自觉站出来革命（他的大字报）表明他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是认识的，是有决心按毛主席的最新指

示去做的,同时,我们也相信,旧剧协的广大革命群众一定会按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对待敢于站出来革命的革命干部的。

我们大字报如有错误,革命同志可以批评。

《雷锋之歌》读者 67.12.16

这张大字报贴出来后,在文联引起很大震动,文联内部以及北京和全国来串联的人、来旁观的人经常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看,并在上边留有小批擦小批的支持。于是,很快在它边上出现了一张小贴,上写:

这张大字报是贺敬之弟弟写的,何必冒充别人呢?

——目击者

言之凿凿,且是一位造反派主力“目击”,这还得了?那些一心一意要打倒贺敬之的人欢欣鼓舞,正摩拳擦掌,策划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料那位“弟弟”,又写出一张大字报:

致“目击者”

这张署名《雷锋之歌》读者的大字报是我写的,我是北京航海俱乐部的工作人员,贫农出身,中共党员,于66年由部队转业。

我对贺敬之同志根本不认识,我写这张大字报只是发表我个人对贺敬之同志站出来闹革命的观点,可是没想到会被自称“目击者”的人别有用心的对贺敬之的弟弟进行诬陷,为了澄清事实,我特此郑重声明:我姓张不姓贺,我是《雷锋之歌》的读者,而不是贺敬之同志的弟弟。望“目击者”收回你

没有根据的谎言吧。

最后,让我们学习一段最高指示:

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结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张万夫 68. 元月

无计其数支持者的大字报、小字报,多则一千多字,少则五六百字,一二百字,即使只有一两句话,也是感情浓烈,态度鲜明。诸如:“我决不相信《雷锋之歌》的作者是黑帮!”“贺敬之同志是难得的一个重视写工农兵形象的诗人。”“要爱护工农作家!”“向革命诗人贺敬之的革命行动致敬!”“我太支持你了!”“你早该站出来了!”……落款有“北航一兵”、“新北大公社三战士”、“无数青年”、“包钢钢铁工人”、“无数革命工人”、“林业工人”、“地质东方红”、“一个‘老’红卫兵”、“云南省勘察设计院出差群众”、“中国科学院《雷锋之歌》读者”、“北京政法学院读者”……至于落款“河南读者”、“四川读者”、“黑龙江读者”、“宁夏读者”、“延庆读者”等等……就更多了。几百几千字的长批或小字报,更是感情真挚、条理分明。其中不少人述说读了贺敬之的全部诗歌,包括解放以前出版过的只要能够看到的诗歌。有一位无名的支持者,对于贺敬之于1947年2月发表的长诗《笑》表示了独自的热情赞扬。最突出的是《雷锋之歌》对他们的影响,许多人声称能够背诵长诗中的许多章节。不少人却是从“你并不认识我们,但我们却深爱着你”说起,分析诗歌与作者的关系,讲贺敬之诗歌对读者的影响,对青年一代世界观形成的作用,对革命的贡献……甚至还有人专门为他写了300多行的长诗《致贺敬之》:“站起来了么?贺敬之/我焦急地敲门询问/……从第一次在万人丛中/看见你,在烈火腾起/风雨狂卷中的那一幕/我就默默无言/转身走开/……/不会的,我相信/

虽然,你的脸色/是那样苍白……”都是那样地情真意厚,不但是用以激励贺敬之,同时也是对那些蛮干的机关造反派的教育和警示。人民群众的爱憎和智慧,不但大气磅礴,而且感人肺腑。我至今读来仍激动不已。

还有一位自称“烈心”的人写了一封近三千字的长信,这封长信是唯一只字不提“文化大革命”,只字不提“黑帮”和“修正主义”等词句的人,就是现在来看,也很少看到“文革”的痕迹,这是很难做到的。现在只能引用其中一些段落:

我和中国许多朝气蓬勃的青年人一样,热爱着你的作品,并且信任你!我们反复地读着你的作品,被你那热情澎湃的诗句激动,我们的心被你那崇高的思想燃烧。从你的诗上,我们看到你对党、人民、祖国有着烈火一般的火热的深沉感情,我可以告诉你,热爱你的作品的人真是数不胜数,我听到过好多同志怀着最亲切的感情,谈论你那烈火一样热烈,大海一般深沉的诗篇啊;有多少人只要一读你的作品,骤然间会心胸开朗,仿佛登上了时代的高峰,目光远大了;我问一些人,你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谁,对方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贺敬之!有多少人随时把你的诗集带在身上,承受你那爱国思想的熏陶,你是多少人的良师益友。大家把你和伟大的俄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并提而论,我们肯定地认为:“你就是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文化革命以来,(唯一提到“文革”之处,但与运动毫无关系)无意中又翻出你的作品,只感到胸中像着了火一样,有一种热情的冲劲,这是一种为祖国献身的激情啊!

你的诗篇具有多么伟大的感染力量,具有无穷的魅力!

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永远热爱你那爱回的诗篇。……只

有你，才配称为人民的诗人。

这位名为“烈心”的评论家，自称是“牧民的儿子”，很可能是一位蒙古族同志，在北京读书长大，因为他的汉语水平是相当高的，知识是相当广泛的。在患难中，遇到这样一位精神支持者，实在是毕生的殊荣！何况这样的支持者，除了能有便串连并写成大字报者以外，何止千万。

在引述这些大字报的时候，心情不能不为之激动，这和《天安门诗抄》的作者们，有着同样无私无畏的精神和抗伪求真的胆识。要知道，这是在“文革”初期，与“四人帮”暴露真面目的“文革”最后阶段相比，人们对于问题的认识程度，自然是有很大差距的。

在极左的狂潮席卷全国之际，在打砸抢的恶浪横滚竖荡日甚一日之际，特别是在全国文联大楼这个冤假错案高度集中的“重灾区”，其污辱、迫害、打砸抢的“漩涡”，比起瞿塘峡的漩涡还要反复无常，还要凶险十倍。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农兵学干和广大青年朋友，以滚烫的语言和铮铮硬骨结成了大字报小字报的钢铁堤坝，爱护、支持、保卫了共同热爱的人民诗人……这事实本身以外，难道还需要再加评语吗？



27 从《中国的十月》到《“八·一”之歌》

从1965年到1976年，贺敬之整整沉寂了11年。整个文坛也是10年沉寂。

在极左思潮的迫害最为严重的时候，内蒙古作家队伍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再想搞文艺，不仅自己不搞，决心让儿女世世代代不要再搞文艺，因为这一行，太危险了，太可怕了。

空气稍稍一缓和，或者听到哪里有落实政策的消息，或者哪位作家发表了什么文章，小道传来什么信息，死寂的“牛棚”则稍有复苏，造反派、工宣队、军管会管辖之下的作家们，则稍有窃窃私议。

那些深受迫害的作家，那些头戴“叛徒、特务”帽子的作家，那些自感永世不得翻身的作家，以毫无仇恨、毫无怨言，反而是充满羡慕、充满祝愿的目光，注视着得以发表作品的作家，注视着作品，打听消息。在军管后“斗批改”的乡下，在劳改农场旧址的冰凉炕头上，在冻成冰砣的井台上，在“备战、备荒”的防空洞里，人们稍有喘息，又悄悄发表所谓“黑线回潮”的言论，传递“黑线回潮”的信息——啊，郭小川哪里去了？贺敬之哪里去了？当李瑛的《红花满山》和纪鹏的诗集出来以后，诗人们非常高兴，特别称赞李瑛在语言大众化方面的追求。可是，大诗人贺敬之为什么沉默不语？为什么一点声息也没有？特别是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以后，《创

业》批示以后，为什么贺敬之不出来？为什么他能够如此耐得住寂寞？

在粉碎“四人帮”的悲喜交加的日子里，轰地一声，空气中发出一阵雪崩似的巨响——《中国的十月》出现了。

这首长诗，不仅是除旧岁的礼炮，也是敲响新时代、结束极左路线统治下漫漫长夜的晨钟。

十年沉默——这是贺敬之的政治态度。

十年沉默，大体上是什么状态呢？

前边已经剖露的，在工农兵学干那么多大字报的鼓舞下，他也未能轻易歌唱。自然，大字报的支持也未能改变他被批斗被隔离审查的命运。

1969年4月，由于周恩来总理过问：“写《雷锋之歌》的贺敬之怎么样了？像这样的人，为什么还不解放出来？”于是，他被宣布“解放”，回《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可见周总理的看法与广大工农兵学干的看法是一致的。

1970年1月，贺敬之任该社文艺部支部书记，依然保持沉默。

1972年，全年在报社“五·七”干校劳动，自然保持沉默。

本年末，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周恩来总理在出版工作会议上指示精神，再版贺敬之的《放歌集》，印了十万册，全国抢购一空。在这样可喜的胜利面前，他并未冲昏头脑，仍然冷静地保持沉默。

根据《贺敬之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周良沛编）贺敬之年表记载：

一九七三年

本年由于《放歌集》的再版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发动反《人民日报》社中所谓“一股邪气”的运动，被“四人帮”的爪牙作为“不肯转变立场”的表现而下令组织“批判”，进而又被

作为“右倾复辟”、“黑线回潮”的重点人物进行多番追查和围攻。

一九七四年

本年在“批林批孔”中被批判。

一九七五年

三月起,由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亲自批示“长期下放,监督劳动”,被下放到首钢,受到干部和工人的照顾和保护。

他整整沉默了十年,对于一位诗人来说,这是多么难忍的沉默啊!这不止是诗人的沉默,也是一切正直共产党员的沉默,也是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沉默,整个时代的沉默……这长期的沉默终于酿成火山爆发:《中国的十月》著成了!

党中央英明果断一举粉碎“四人帮”,体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意志,《中国的十月》唱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

《中国的十月》是一次决定命运的伟大战役的辉煌纪实。它是党心、军心、民心的心心相印而又交相碰击的共鸣,它以鼙鼓般紧密的点数,写下了这场严峻的斗争:

在中国,
在十月。
命运大搏斗的
风风雨雨,
我们心潮激荡的
日日夜夜——
怎能不想啊
那长征路上
莽莽昆仑“这多雪”?

现实斗争的惊心动魄，与革命历程的艰难、曲折、险阻，一下子结合起来，让人感受到极其沉重的分量。

十年沉默，久违了！还是那位诗人，还是那腔热情，却是扛着刑枷带着伤痕走了出来，依然是不屈战士的风姿！

在北京，
在十月。
中南海内
波浪起伏，
长安街上
灯火明灭——
怎能不念啊
娄山关前
“而今迈步从头越”？

啊……
一九七六年，
惊心动魄的十月！
天安门城楼
连接着遵义城堞，
大会堂前
似见当年
那会址的台阶。

功夫既在诗内，又在诗外，画面既在画内，又在画外。现实、历史，一再反复，一再加码，一直加到积重如山，加到“地崩山摧壮士

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的——五丁开路的程度。

这是一部党内斗争的史诗,也是一部阶级搏斗、命运搏斗、光明与黑暗搏斗的史诗。在当时所有描写这场伟大斗争的诗篇中,没有比这一篇更全面、更深刻、更精确、更精炼、更有概括性。

斗争的险峻与惊心动魄,贯注于气韵的连贯和语言的流畅之中,语言的通俗与通达,含蓄与含量,精炼与精彩,都属于贺敬之专用而独有的。

“中南海内/波浪起伏,/长安街上/灯火明灭。”——没有直接写党内斗争动荡的画面,让人一看便想到画外,想到党内斗争激化到何种程度。而“起伏”与“明灭”的画面对衬与语言对仗,表现出党内与党外的呼应,党心与民心的心心相印。笔锋串连的诗句,是镜头,又是钻头,横向的现实写照与纵向的历史钻透,自然而和谐,悲壮而厚重,整体而立体,旋转起悲壮的情绪扶摇直上,直入云霄而不轻飘。一句“莽莽昆仑这多雪”(类似的还有数句),把现实意义与历史的深远意义结合起来,提升到尖锐的顶峰与苦难的顶峰。不错,“四人帮”的迫害以及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确实可以累成一座积满冰雪的昆仑山。诗意又岂止这样简单?岂止落脚于苦难的深重?诗意最终落脚于斗争的艰巨和胜利来之不易。其语言的运用,由精确达到终极。如换其它语言,便达不到这般终极效果。例如表现全党全民对于“四人帮”所恨的程度与解恨的程度——“无产阶级巨手,终于捉住了这窝蛇蝎!”这个比喻是再精确不过了,江青和张春桥之流不仅是善造反革命舆论的响尾蛇,又是恶毒无比的眼镜蛇,暗中下毒手的双尾蝎……蛇蝎又是一个帮派体系,是共栖一窝的害人虫,而“终于捉住”一词,则使人想到从“二月逆流”,“杨、余、傅事件”,邓小平复出到“天安门事件”,斗争已有好几个回合,波浪已有好几次起伏,全党、全军、全民要粉碎“四人帮”的尝试已有多次。而巨手捉住蛇蝎,让人想到这次胜利不是轻